

最近，党中央提出建设西藏的任务和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中央指示的基本精神，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力治穷。这个精神不仅适合于西藏自治区，而且对于各个地区和各条战线都有启发思想的作用，它将激励广大干部和群众为治穷致富而奋斗。

我们国家已经解放30年了。在这30年中，我国在政治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方面也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整个说来，还是很穷的。个别省、区，特别是某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和某些偏僻的老革命根据地，那里人民更穷。他们辛勤劳动一年，所得却甚微。不少人家手无钱，锅里少米，身上缺衣，连较低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一定要领导群众大力治穷，使这些地区的人民尽快地摆脱贫困状况，逐步富裕起来。

要治穷，首先要端正对穷和富的认识。认为穷是社会主义，富是资本主义，制造出“穷革命”、“富则修”的谬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他们把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到处“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路”，“反对集体经济的资本主义倾向”，等等。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我们许多干部思想上怕富，政治上怕富，措施上怕富，门路上堵富，分配上卡富。那个时候，群众也怕丰富，怕露富，更怕把自己当成“暴发户”。于是，在干部和群众中普遍存在一种“恐富症”，盼富又不敢富，大家只好绑在一块穷，似乎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

是不是越穷越革命？在阶级社会里，穷或富，是同占不占有生产资料相联系的。地主资本家靠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剩余劳动而发财致富；劳动者则由于丧失了生产资料，遭受剥削而一贫如洗。在旧社会，穷是受剥削、受压迫的结果。处在一无所有地位的无产阶级是最反对现状，最强烈要求改变自己地位的，因此最有革命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只有起来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权，改变所有制，才能创造由穷变富的客观条件。所以那时说“穷则思变”，穷则思革命，是有一定道理的。

今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早已成为国家和生产资料的主人，大家都生活在集体之中，人人平等劳动，按劳分配，已经具备了由穷变富的客观条件。这时再说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就毫无道理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能“送穷”，而绝不当“领穷”。

富了会不会变穷？富和修之间根本没有必然的联系，认为富了就会变成资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在于富，而在于榨取剩余价值。我们共产党只反对剥削，从来不反对富裕。富裕作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概括，并不专属哪一个阶级，而是人类共同向往的。所以，在对治富的问题上，关键要看是劳动致富，还是剥削致富。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群众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劳动致富，不仅不应当指责和限制，而且应当大大鼓励和支持。劳动致富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更不会导致党变修、国变质。林彪、江青一伙不分区别劳动致富和剥削致富，把二者混淆起来，胡说富就是修正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实际上是贩卖他们那套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

害怕富裕是一种糊涂思想。四十多年前，斯大林就批评过苏联党内这种怕农民富裕起来的糊涂思想。斯大林说：“当有资本主义分子并且有受资本家剥削的穷人的时候，列宁主义者是依靠穷人的。但是当资本主义分子已被击溃，穷人已摆脱了剥削的时候，列宁主义的义务就不是要巩固和保存已经被消灭了存在前提的贫穷现象和穷人，而是要消灭贫穷现象并把穷人提高到过富裕生活的水平。”（《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8页）今天重温斯大林的这些话，对于我们克服那些怕群众富的“左”的思想障碍，仍然是很有教益的。

我们党的这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穷致富，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我们党不领导群众去治穷，去抓富，就不能使群众由穷变富，过上富裕的生活，那么，群众就会觉得跟着共产党走没有意思，他们就会从根本上脱离了人民群众。多年来，由于我们没有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没有领导好群众治穷，党的威信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大力治穷，由穷变富，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剥削，能够保证全体劳动者支配和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从而使全体共同富裕起来。列宁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根据科学的见解来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也就是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应该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一点。”（《列宁选集》第3卷第571页）我们一些同志并不真正了解这个真理，他们不懂得，穷是战不胜资本主义的，穷也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建成，那是愚蠢的。社会主义制

领导群众治穷是共产党的天职

本报特约评论员

于富，而在于榨取剩余价值。我们共产党只反对剥削，从来不反对富裕。富裕作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概括，并不专属哪一个阶级，而是人类共同向往的。所以，在对治富的问题上，关键要看是劳动致富，还是剥削致富。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群众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劳动致富，不仅不应当指责和限制，而且应当大大鼓励和支持。劳动致富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更不会导致党变修、国变质。林彪、江青一伙不分区别劳动致富和剥削致富，把二者混淆起来，胡说富就是修正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实际上是贩卖他们那套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

害怕富裕是一种糊涂思想。四十多年前，斯大林就批评过苏联党内这种怕农民富裕起来的糊涂思想。斯大林说：“当有资本主义分子并且有受资本家剥削的穷人的时候，列宁主义者是依靠穷人的。但是当资本主义分子已被击溃，穷人已摆脱了剥削的时候，列宁主义的义务就不是要巩固和保存已经被消灭了存在前提的贫穷现象和穷人，而是要消灭贫穷现象并把穷人提高到过富裕生活的水平。”（《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8页）今天重温斯大林的这些话，对于我们克服那些怕群众富的“左”的思想障碍，仍然是很有教益的。

我们党的这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穷致富，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我们党不领导群众去治穷，去抓富，就不能使群众由穷变富，过上富裕的生活，那么，群众就会觉得跟着共产党走没有意思，他们就会从根本上脱离了人民群众。多年来，由于我们没有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没有领导好群众治穷，党的威信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大力治穷，由穷变富，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剥削，能够保证全体劳动者支配和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从而使全体共同富裕起来。列宁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根据科学的见解来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也就是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应该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一点。”（《列宁选集》第3卷第571页）我们一些同志并不真正了解这个真理，他们不懂得，穷是战不胜资本主义的，穷也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建成，那是愚蠢的。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最根本的是使人民群众富裕起来。如果社会主义不能使人民群众摆脱贫穷，过上富裕的生活，人民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如果这样，群众就不会欢迎社会主义，就不会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而奋斗。

总之，大力治穷，由穷变富，是共产党的天职，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把穷和社会主义联在一块，是地地道道的假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极大歪曲。

治穷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抓那些经济上贫穷的、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和某些省份的长期落后的地区。

这些地区为什么长期没有根本改变贫穷面貌？尽管具体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根子是极左。当前，为了肃清极左的影响，必须从方针政策上加以调整。

在少数民族地区，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要充分行使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利（在汉族地区，也要适当扩大地方权力）。民族自治权就是民族自治权，没有民族自治权，就不能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没有民族自治权，也就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必须认真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尊重民族自治权利。这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力治穷的首要条件。

要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大大减轻群众的负担。在贫穷落后的地区，在处理人民群众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上，要首先照顾群众的利益，尽力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在同类地区，在最近三、五年内，可以考虑减免征购任务，国家可以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通过过牧、放牧等办法，鼓励生产队和社员将多余的产品交给国家，要免除一切形式的摊派任务，坚持等价交换，禁止无偿平调。

要实行特殊的灵活的政策，调整经济关系，把经济搞活。在所有制方面，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要允许几种经济成份和几种经营形式同时存在。除鼓励社员办好集体经济积极性外，还必须利用他们个体经济或个体经营的积极性，认真落实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和家庭副业政策。集体经济规模不适当的，可以在适当时候有组织地进行一些调整。生产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包括包产到组。个别居住偏远的独门独户，也可以包产到户。在城市里，除发展集体所有制外，有相当一部分可以搞个体经营，开设夫妻老婆店。工业、手工业、交通、财贸、外贸等方面，也都要放宽

政策，实行灵活措施。

发挥优势，广开富路。比较贫穷的地区，大多是山区、牧区，这些地区一般都是人烟稀少，地域辽阔，资源丰富。要按照这些地区的自然条件，发展那些适宜发展的东西。如西北、西南广大地区，包括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省、区，应当充分发挥草原的优势，大力发展畜牧业和畜牧业加工。如果这些地区能认真地利用自己的自然条件的优势，逐步发展畜产品的粗加工，进而搞精加工，许多牧区人民的收入很快可以显著增加。

贯彻党的政策要从实际出发。贫穷落后的地区在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方面，与比较富裕的地区相比，差别都很大。因此，对这些地区，决不能搞一刀切。什么工作都搞一个标准，一律照办，整齐划一，统一进度，一刀切，那是根本行不通的。过去我们最大的教训，恰恰是不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论农区与牧区，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发展快的地区与落后的地区，什么都搞一刀切，一个样。这种不从实际出发，不承认差别，不承认差别，是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它使我们在实践中到处碰壁，使工作遭受巨大损失，给当地人民带来很大困难。这是这些地区长期没有摆脱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呼声：“这个问题，中央没有指示呀！”“没有正式文件不好办呀！”等等。我们搞四化，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明确的，问题是你那个地方怎样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加以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只能从全国的普遍情况出发，各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必须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如果有中央的东西，自己不是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特点，提出实施的具体办法，而是生搬硬套，执行“不走样”，我们还会吃主观主义和片面性的亏头。因此，任何一个领导干部，任何一个领导者，首要的任务是了解和掌握自己管辖的地区或部门的情况，从实际出发，把共性和特殊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解决自己的问题。

现在，我们国家与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是很穷的。我们全党，我们整个国家，都面临着治穷的任务，实现四化就是治穷的根本办法。在贫穷落后的地区，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办好事，当前最紧迫的就是要领导群众千方百计治穷，使这些地区的人民在物质上和文化上尽快地提高起来。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如果一个领导者在很长时期内还不能改变自己所属的那个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就是最大的失职。今后，衡量一个领导者工作的优劣，主要应当看他所领导的地区是否生产年有所发展，人民是否逐步富裕。只要我们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同心同德，大干四化，治穷就会较快地收到显著成效。

北京市闹菜荒已有4个年头，今年尤为突出。从春节到现在，买菜难的问题一直没有缓和，街头如果有“长龙”，大多是买菜的。

北京城区和近郊区每天至少需要五、六百万斤鲜菜上市，可是，在菜少的时候一天才上市100多万斤，每人每天平均只能吃到二、三两菜，品种也很单调。过去每到6、7月份，北京街头西红柿成筐成堆，人们花上一角钱，就能买到好几斤。这种“好景”近几年再也看不到了。群众喜爱的果类菜上市量不断下降，其中以西红柿、茄子、柿子椒和冬瓜减少的幅度最大，质量也越来越差。

蔬菜供应搞成这种局面，不仅消费者有意见，农业、商业部门不少同志也感到痛惜和不安。他们说，连年闹菜荒，有生产和管理方面的问题，但关键是在生产和管理抓得不够，主要表现在北京市分管蔬菜工作的领导人变动频繁，分工抓蔬菜的领导人又很少下到基层调查研究，不掌握第一手材料，还出了些不切实际的意见。群众批评这种领导作风是“情况不明决心大”，其次，由于有关领导认识不一致，政出多门，有点各行其是。例如，有的说蔬菜打破蔬菜统购包销，今天主张二、八开（指统购和统购的比例），明天又说三、七开。过几天又都不算数，弄得下面无所适从。蔬菜产销办法改革方案，从去年10月到今年4月，半年时间内反复八、八次之多，直到4月中旬，农商双方才签订合同下来，使不少菜的播种误了农时。

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北京市蔬菜生产、供应工作是做得好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密切农商关系。蔬菜生产队长和菜店经理，一年开几次产销见面会，研究解决发生的矛盾，落实蔬菜生产和上市计划。平时遇到问题也能互相协商、体谅。近年来，这个好经验被弃置不用了，出了问题农商双

方互相埋怨；在市委蔬菜领导小组和市府蔬菜办公室内部，农、商双方的意见也常统一不起来，许多问题议论也不决。

对蔬菜工作领导不力，还表现在近郊农业以菜为主的方针不能落实。近年来，近郊区社队大力发展工业，与蔬菜生产的矛盾日益突出，市委领导从没有认真研究及时解决。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种菜收入高于种粮，以菜为主的方针贯彻得很好；1970年前后，强调“以粮为纲”，给蔬菜生产带来一些影响；1977年和1978年以来，菜区社队的工业发展很快，经济构成发生重大变化，总收入和社员分配，以粮为主变为以工业为主。有些以粮为主的公社由于工业收入多，社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对抓菜不那么上心了，以至农田耕作粗放，蔬菜产量、质量都明显下降。不少同志忧虑地说：北京近郊以菜为主的方针能否不落空，不管市里开多少会，蔬菜问题也难以解决。

提起连续几年的菜荒，北京市有关部门总是埋怨“老天爷”不作美。气候不好是客观事实，但没有主观原因呢？近几年很少听到主管部门从这方面进行总结。据记者查阅历史资料，同样阴雨连绵的夏季，七十年代前期，尤其是七十年代初期，8、9月份淡季并不淡，那时城市人口没有现在多，而上市蔬菜数量和品种都比现在多。这说明事在人为，气候影响不是主要的。

记者在调查当中，接触了各个方面的人员，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大家普遍认为，要从根本上扭转北京市连年闹菜荒的被动局面，必须认真落实中央书记处四项建议中关于“大改善蔬菜供应”的指示。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应该多倾听群众呼声，采取切实措施，改进和加强对蔬菜工作的领导，真正解决好群众的吃菜问题。

本报记者 邱永生 陶 远

河南省南部暴雨成灾

省委和省政府领导人民全力抗洪

据新华社郑州7月9日电 河南省南部暴雨成灾，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全力抗洪。

6月以来，河南省南部地区连续降雨，6月23日至24日又普降暴雨。在淮、洪、汝、汾泉河流域的部分地区，形成洪

涝灾害。

洪水发生前，河南省有关部门就作了预报。洪水发生后，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省长刘杰等负责同志亲赴灾区指挥抗洪救灾，灾区广大干部、群众和驻军也积极投入了抢险救灾斗争。

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办公室和民政部也分别派出了工作组来到受灾地区慰问群众，了解灾情。

讲究经济效益

不追求净增指标

青海畜牧业取得良好成绩

据新华社西宁7月9日电 青海省牧区注意讲究经济效益，不追求净增指标，采取措施，对不过冬的瘦弱牲畜及时作了处理。截止6月上旬，全省牧区育成各类仔畜314.6万头，比去年同期增加31万头多；成畜损失比去年同期减少六万余头，取得了良好成绩。

前几年，青海牧区有些地方单纯追求牲畜净增率，不考虑经济效益，致使有些地方的牲畜头数超过了草原载畜能力，引起草场和牲畜退化，瘦弱牲畜大量增加，一到冬春季

节，牲畜大量死亡，给牧业生产带来很大损失。

去年，青海省委总结了这一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地畜牧业生产方针作了调整，截止今后衡量畜牧业生产的好坏，主要看经济效益，即牲畜的总增数和商品率，不追求净增数。省委还号召各地积极处理不过冬的瘦弱牲畜，减少冬春死亡。省委这一决定，受到牧区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入冬前，各社队普遍处理了一批瘦弱牲畜。瘦弱牲畜减少后，去冬今春成畜减损大大下降。

要重视淡水养鱼

很好，现有山塘、水库、鱼塘等水面面积将近5万亩，还有很多小坑、洼地、深水田等。全省28个公社，社社都有可以养鱼的水面，东山、旧州、谭文等公社淡水养鱼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但是长期以来，由于重视不够，没有专人负责，缺少科学管理，致使淡水养鱼发展缓慢。如去年全县放养淡水鱼的水面仅占可利用水面的36%，而且鱼苗成活率低，收获甚少。

水库塘堰养鱼潜力很大

鄂西北山区丹江水库的水面在那县范围内达31万多亩，比本县小型水库塘堰，这个县共有水面32万多亩，发展淡水养鱼的潜力很大，可惜没有得到利用。现在，除百万亩以上水库养鱼外（单产每亩只十来斤），其他塘库大都不养鱼。丹江水库也是只捞不养，亩产才一斤多鱼。因此，这里很难买到鱼。为什么不发展淡水养鱼？原因有以下几点：一、领导不重视。只注意向上“摇钱树”要钱，不注意

西藏抓紧治理病虫害夺丰收

据新华社拉萨7月9日电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无偿拨出240万元专款给农村社队购买农药和喷雾器消灭农作物的病虫害。目前全区农村已基本控制住蚜虫以及由蚜虫传播的黄花叶病对冬小麦的危害，对少数地区春播青稞出现的病虫害，正在抓紧治理。广大干部、群众对夺取今年农业丰收充满信心，田间管理工作搞得扎扎实实。

党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放宽经济政策的布告，使西藏农村的干部、群众受到极大鼓舞。目前拉萨和山南谷地，青稞苗齐茁壮，冬小麦穗多穗大，油菜、豌豆、蚕豆正扬花结实，长势普遍比往年好。社员们正积极锄草灭虫，并做好防洪防雹的准备。江孜等地的燕麦草比往年显著减少。东南部地区人们正加紧管理，以防庄稼脱肥早衰。



陕西省渭南地区大荔农场种植的香料长势好，出油率高。这是干部和生产技术人员在一起总结丰产经验。

李汉林摄

把渔业尽快搞上去

最近几天，看到广大社队干部和群众对渔业很有兴趣。他们认为养鱼比养猪投资小，“油水”大。据白城地区不完全统计，现在社队养鱼单位已从去年140多处发展到210多处。扶余县的陶赖昭、伊家屯、大三家子等社镇的社员，在房前屋后挖坑或围筑自然小坑塘养鱼。

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是缺乏领导，缺少资金，不懂技术，管理混乱，有的鱼塘修好了，因筹措不到钱而投不进鱼苗；有的放养密度超过标准的几倍、十几倍；有的把野杂害鱼与家鱼混养；不少地方渔业秩序非常混乱，偷捕、抢捕，甚至出现高价倒卖鱼货现象。这些问题如不立即引起注意，切实加以解决，弄不好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出现“一轰而起，一哄而散”的局面。

建议各级领导切实加强领导；希望水产部门要通过举办短训班或召开现场会等形式普及养鱼知识，交流养鱼经验；希望财政、银行、信贷部门要在资金上给予适当安排；希望公安部门和工商管理部门要积极协助水产部门维护渔业秩序，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正常渔业生产。各方面都要促进群众养鱼事业的发展，渔业这条短腿一定会很快上去。

吉林省白城地区水产站 李云生



广东省琼山县 林芳善

湖北省郢县 余超 杨锦国 王长江

